

试论周公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周易》“心法”之关系

徐仪明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周公与《周易》“心法”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周公作为《周易》的作者之一,对“心”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远见卓识,其对“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理解得相当透彻,把“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思想奠基在“心”范畴之上。因此可以说《周易》中的“心惻”就是指的《周易》心法或周公心法。在《周易》心法中有突出了情感性的政治哲学思想,特别是悲忧惊恐惧之类的情感,具有多种积极性的因素。而忧患意识则是《周易》心法的精髓,其像血液一样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管之中,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人们念兹在兹,不可须臾或离。从根源上来看,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周易》心法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之一。

[关键词] 周公;《周易》;政治哲学思想;心法;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182(2015)01-0009-06

关于周公(约公元前1100—公元前1032)的研究10多年来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专著,如杨朝明教授的《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游唤民教授的《周公大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从而使我们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政治、军事以及哲学诸方面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与之相应的,还出现了一个旧话重提的现象,那就是过去被否定了的周公与《周易》一书的关系问题,现在又被人们重新认识,并且肯定了周公对《周易》的著作权(至少是部分著作权)。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新的视野来对周公与《周易》(这里当然指的是《易经》)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探讨和研究。本文主要打算从在《尚书》、《逸周书》、《史记》和《周易》等古代典籍中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来谈谈《周易》的“心法”问题。不当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一、周公对“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周公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具有崇高的重要地位,被视为黄帝之后孔子之前最有影响的伟人。所以历来人们对于周公无不倍加赞美和推

崇。杨向奎先生就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此所以孔子要梦见周公,更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后人称周公曰‘文’!我们不是过分强调周公,他一人也做不出许多伟大事业来,但他是这许多事业中的代表人物,历史上这种代表人物越多,文明越昌盛,否则衰,这是一般人都了解的道理。”^{[1]41,142} 周公作为殷周之际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一生辅国安邦功绩卓著,在思想文化理论方面提出了“敬德保民”“引德人礼”,制定了传世的礼乐文明,并把“礼”建筑在“德”的基础之上,其重大意义已如杨向奎先生所揭示的不仅对西周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各民族的团结融合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奠定中国自古以来人文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作为“大道之源”的《易经》其爻辞的著作权归属于周公在东汉时期已经为学者如马融等所肯定,到南宋朱熹更明确地把周公纳入到了《易经》

收稿日期:2014-12-04

作者简介:徐仪明(1952-),男,河南开封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的作者系列中去,认为《易经》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卦辞和爻辞分别由伏羲、周文王和周公三人完成。只是到了“古史辨”派学者举出卦爻辞中的所涉及的一些事例和人物,如“康侯”“箕子之明夷”都在文王之后,由此认为《易经》的卦爻辞不可能是文王或者周公的作品。但李学勤先生近年来又提出了新解。他在论及“康侯”时说,康侯一词未必就是指的周公之弟,“康”可以是一个形容词,如:“康,安也”;“康,美也”;“康,尊也”等等。“康”还可以是一个地名。可见对“康侯”一词的意义早已不能知道。但是我以为即使康侯就是指的周公之弟,其将他的事迹写入爻辞之中也是可能的。关于“箕子之明夷”中的箕子,李先生指出其在商朝覆亡之后,向周武王陈说天道,有关传说见《尚书·洪范》,其中论及卜筮。因此,“《周易》经文所见人物及其事迹,确实都是很古老的。经文的形成很可能在周初,不会晚于西周中叶”^{[2]18}。所以说文王重卦周公系辞的传统说法并没有能被真正否定。甚至恰恰相反,通过对周公事迹和思想的研究,在参照和比对《周易》爻辞中的内容,我们更能够断定周公就是《易经》一书的作者之一。为什么要首先探讨一下“作《易》者”这个既古老而且又聚讼纷纭至今还没有定论的问题呢?因为这与本文所要研究的主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读其书一定要知其人,所以确定“作《易》者”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工作。

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曾“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句话引出曹操著名的诗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同样是政治家的曹操一语中的,指出周公为得到天下贤德才俊之士呕心沥血,其目的是要人心所向,人心所归,才能够万邦咸宁。“得人心者得天下”,周公早已懂得了这个道理。周公“敬德保民”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之心应该以“德”为本,具有善恶爱憎等道德观念,并以此作为内心中一切情感和愿望的出发点,因此也可以说,周公所说的“心”就是指的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在《尚书·酒诰》中,周公共有三处提到“心”。其曰: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遗训,越小大德。^{[3]286}

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蠹伤心。^{[3]290}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

畏死。^{[3]290}

上引第一段话的意思是根据文王的遗训,作为臣民要爱惜财物,使自己的思想情感始终处在良善的状态之中。不论是大德之人,还是小德之人,都要具有善心。第二段话的意思是近世的商纣王,好酒纵乐,以为有命在天,漠视百姓之事,罔顾民怨,不思改悔。其淫乱无度,败坏法纪,丧失了君王应有的威仪,令臣民悲痛伤心。第三段话的意思是商纣王只想着纵酒取乐,哪里考虑自己的过失。心地恶狠的他,因此就离死不远了。这三段话归纳起来只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段为褒,赞美良善之心;第二、三段为贬,鞭挞邪恶之心。在《尚书·立政》篇中,周公又说:“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3]377}即谓人君如能从三个方面察知具有恶人之心的人,黜之皆得其所;具有贤俊之心的人,用之皆得其位,那样便可以上合天意,下得民心,政无不成。周公在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时,经常运用将善恶之心加以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以显示其憎爱分明的政治立场。

在《易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述方式。比如:《益》卦九五爻辞:“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其即是说要有诚信惠施于心,这样不必占问便可逢凶化吉,有所收获。“有孚惠心”就是指的要有一种敬德之心,诚信为处世之本。显然,这是赞赏诚信这种美德,认为要始终坚持把诚信维系于心中,这样才能亨通,才能顺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在《益》卦的上九爻辞则有:“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这是讲的在人群中生活,不要损人利己,遭人怨恨,因此必须“立心”,即在心中树立牢固的正确的思想观念,长期持守,恒久不变。“立心”具有类似今人所说的确立一种正确的政治观和高尚的人生观的意味。在《艮》卦九三爻辞则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朱熹《周易本义》说:“厉熏心,不安之甚也”^{[4]46}。高亨解释“熏心”二字为心中迷乱^{[5]313}。总之这是指的一种混乱的精神状态,顾此失彼、迷乱不清。处于此种精神状态的人,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立心”和“熏心”恰好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正面的,后者是负面的,这与前面我们在《尚书》引述的例子明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说明周公的政治哲学思想观念中具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方法。

《易经》中还有一处谈到“心”的问题,我以为

更具有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井》卦九三爻辞中的“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一语值得特别注意。《说文》：“恻，痛也。从心，则声。”《广韵》“恻，怜也。”按照一般性的解释，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井修治好了，却不被使用，使我感到悲痛。心恻，即悲伤、悲痛之意。然而，如果我们结合《周易》经、传全文以及后世一些著名解《易》的篇章来加以释读的话，就会发现“心恻”二字有着多种深刻的含义，也可以认为其就是《周易》的心法。

后世诠释者对“心恻”一词的理解大致如下：

程颐《易传》：“恻，恻怛。”“怛”的意思，《释文》曰：“怛，惊怛也。”《广韵》曰：“悲惨也。”《增韵》：“惊也，惧也。”可见心恻具有惊恐忧惧之意。

《周易集解》引于宝语“恻，伤悼也。”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有“坎为加忧，故恻”之语，其又申论之：“坎为心，二折坎心，故恻。”强调了心恻“为加忧，为心病”“为伤悼”，突出了忧伤的涵义。

应该说以上的解释并非没有根据，参之以《周易》经传内容就能够明白。在《易经》中喜、悦之类的情感描述不多，而对忧、惧、悲、惊、悔、不快等较为沉重的情感因素认识得相当深刻。下面做一简单论述。如《乾》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曰：“乾乾：闻一多谓当读为悁悁。悁，忧貌。”再如《小畜》卦六四爻辞谓：“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李镜池释曰：“血：借为恤，忧患。”另如《涣》卦上九爻辞：“涣其血去逖出，无咎。”李镜池谓：“血去逖出：同于《小畜·六四》‘血去惕出’，血借为恤”，同样解释为忧患、忧虑。而值得注意的是，忧患、忧虑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好的即“无咎”。《易经》还直接提到“忧”字：《丰》卦卦辞“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临》卦六三爻辞“甘临，无攸利。即忧之，无咎”。《易经》中也提及“愁”，如《晋》卦六二爻辞“晋如愁如，贞吉”。同样，“忧”“愁”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好的“无咎”“贞吉”。《易经》中忧患意识是相当深沉和凝重的，无怪乎《易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作为一种情感已经弥散和渗透到作易者整个思想意识之中了。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说：“《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自古以来，解易者多认为《坎》卦表示忧愁、忧患，如上引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所说：“坎为加忧，故恻。”即所谓忧中有忧、忧之又忧。

刚才我们说到“心恻”还有惊惧悲恐诸意，这些在《易经》中也都有体现。如“惧”。《乾》卦九三爻辞中有“夕惕若厉”，其中的“惕”字，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怵惕也。郑玄云，惧也。《广雅》同。”另外，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中提到“愬”字，他说：“《履》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子夏传》曰：‘愬愬，恐惧貌。’”指出“愬”也是“惧”的古字。“惊”在《易经》中反映则是“错”、“敬”二字。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说：“《离》卦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错读作斟，《说文》曰：‘斟，惊貌。’……敬读为惊。”也就是说，“错”、“敬”都是古“惊”字。至于“悲”字虽然在《易经》中并未出现，但却有着不少悲伤悲痛等情感的描述。如《屯》卦上六爻辞中有“泣血涟如”，李镜池《周易通义》释为：“泣血：泪尽而继之以血，极言其悲痛。涟如：本是形容水泛起波澜的样子，这里是形容血泪不断地流。”《离》卦六五爻辞“出涕沱若，戚嗟若”，也是形容泪如雨下，忧戚叹息，极其悲伤。另外，在《同人》卦九五爻辞有“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和《旅》卦上九爻辞中“旅人先笑后号咷”的“号咷”二字同样表现的是极度悲伤。古人云：“有声有泪谓之哭，有声无泪谓之号，有泪无声谓之泣。”这是撕心裂肺的哭号。与悲恐惊惧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不快”和“悔”。“不快”在《旅》卦九四爻辞和《艮》卦六二爻辞各出现一次，可视为悲恐惊惧的初始阶段。“悔”字在《易经》中凡三十一见。高亨说：“《说文》：‘悔，恨也。从心每声。’《广雅释古》：‘悔，恨也。’《诗·云汉》‘宜无悔怒’，《毛传》：‘悔，恨也。’《论语·为政篇》：‘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皇《疏》：‘悔，恨也。’按，悔恨之情比悲痛为轻，悔恨之事不及咎凶之重。”^{[5][13]}显然，在《易经》的大部分卦的卦辞和爻辞中都出现了表述忧悲惊恐惧诸情感方面的内容，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这些散在于卦爻辞中忧悲惊恐惧等情感心理的描述，怎样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呢？显然这是一个人人意中所有，人人语中所无的事情，那就是尽管大家都看到“心恻”一词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但并没有将之明确用作对《易经》这一情感心理论述的总结性范畴。我们现在这样做，并不是匪夷所思故作惊人之语，而是遵循了前人解易的基本思路，将之明确化了而已。所以，以“心恻”作为《易经》中忧悲惊恐惧等情感的代表性词语，应该是相当准确和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周易》心法中的情感政治哲学思想

既然情感问题在《易经》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我们前面说了忧悲惊恐惧等情感论述是周公政治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说《易经》中就没有出现过愉悦之类情感的字眼,诸如《兑》《否》《无妄》《损》等卦中的“喜”;《兑》卦中的“兑”(即“悦”);《同人》《旅》《萃》《震》等卦中的“笑”,然而这类字眼的比重和分量远没有描述忧悲惊恐惧等情感内容的字眼那样重要、那样富有意义。这些关乎情感的内容首先应该依然与“作易者”即周公相关联,所以还要结合周公的事迹加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问题的实质和真正弄懂相关内容的真实含义,并深入发掘出其中的奥义。

下面,我们进一步通过研究周公的生平事迹,做一些较深入的论证。在《尚书·立政》中有这样一句话:“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这是周公告戒周成王要居安思危,时刻持守一种悲忧之心。《尚书·周官》:“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这虽然是以周成王的口吻说出的话,但依然表达的是周公的意思。其与上一句话有着十分近似的涵意,其强调了要深刻理解什么是敬畏、畏惧,就是说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畏惧,就会陷入真正令人畏惧的困境。在《尚书·召诰》中,周公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当以周代殷的革命胜利之时,面对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周公仍然深怀着无尽的忧虑,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尚书·大诰》中周公反复说“予惟小子若渊涉水”,“肆予冲人永思艰”,“朕言艰日思”;在《尚书·无逸》中周公告诫周成王“君子所,其无逸”而拒绝淫乐,等等。这些内容依然包含了要以忧惧的心情来面对人生和社会,这样才不会铸成大错。的确在《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周公深怀忧虑恐惧之类情感的记述,而在《逸周书·度邑解》中直接能够看到:当周武王与周公论及应尽快驯服殷顽民之时,“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对”;当武王命周公继承大位之时,“叔旦恐,泣涕共手”,可见周公时常怀着戒慎警惕的心态。周公不仅自己忧国忧民,并且要臣下也要效法自己,《逸周书·皇门解》记有周公所言:“朕苴臣,夫明尔德,以助予一人忧,无维乃身之暴皆恤。”即为明证。我们似乎无需去更多地寻找类似的例证,周公一生戒慎警惕的情状已经跃然

纸上,他的悲情意识跨越数千年的时空隧道为今人所了解,使我们对《易传·系辞下》中那句名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刻的认识,也使我们有机会通过对《周易》的研究来总结出其中可以名之为“心恻”的心法,或者也可以将之称做周公心法。

那么,《周易》“心恻”的心法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其实在前面的文字里我们已经多多少少透露了一点,那就是每当《易经》中出现忧悲惊恐惧等情感内容时,不利的因素就会向积极面转化,而会有诸如“吉”、“无咎”等字眼随之其后,这是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下面,我们想稍微更具体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时人们怀有悲伤和沉痛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然而为什么在战争中那些拼命厮杀的将士也要怀着哀痛的心情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哀兵必胜”的名言,说明这个道理是被历代兵家所认可的。然而其出处何在呢?我认为就出自《易经》。《同人》卦九五爻辞说:“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军克相遇。”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对之作了解释:“《释文》:‘号咷,啼呼也。’《说文》咷下云:‘楚人谓儿泣不止曰咷嗽’。咷嗽与号咷义同。先号咷而后笑者,先悲后喜也。《旅》上九云‘旅人先笑后号咷’,先喜后悲也。可以参证。《尔雅·释言》‘克,能也。’此殆古代故事。盖有一军被敌人围攻,将就歼灭,相聚大哭,乃突围而走,幸遇援兵相救,而转败为胜,故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5]201-202}号咷者,极言哀痛也。哀痛可以化解愤恨、狂怒等非理性情绪,从而使人恢复到正常的理智状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里提到的“悲胜怒”,即是指用悲哀战胜愤怒,可知其有一定的生理学基础。如果拿高亨所释《同人》卦九五爻辞所说的一支军队被敌人包围,如果群情激奋,定会死打硬拼,莽撞行事,其结果会招致惨败甚至全军覆没。但军中主帅(或就是周公本人)始终以哀痛的心情来化解将士们的愤怒,而激发全军上下的勇气和智慧来战胜敌人。显然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悲胜怒”的问题,而且包含了一种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重要的人生心得和方法,其不仅外显为某种气质风度,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恻”心法具有内在的神秘力量,值得去做进一

步的深究。这里还要稍稍论及《旅》卦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一句。王国维、顾颉刚等前辈已指出这里讲的是殷之先人王亥的故事。李学勤《周易溯源》引《竹书纪年》云：“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李先生据此和其他相关史料得出结论说：“总之，《旅》卦这条爻辞虽然简短，却包含了王亥故事的不少细节，足见其年代甚早。”^[27] 我以为，周公举出这一事例来讲述乐极生悲的道理。他以王亥耽于淫乐而遭杀戮，牛羊等财物尽失的史实来教育周室子弟，颇为语重心长。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周公对“笑”之类的张扬性的情感情绪有着深深地厌恶之情。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有“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已经从情感情绪的发生学角度总结出乐极生悲的道理，可见是对《易经》情感理论的发展。

当然，喜乐哀惧之类的情感应该不会是单一式存在的，有喜就有惧，有哀必有乐，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可是我们在《易经》中发现，由于哀惧的情感形成了一种基调，喜悦欢乐也就有所“变异”。且以“悦”为例。《易经》中的“兑”即“悦”。李镜池《周易通义》说：“兑：悦本字。徐锴、段玉裁、朱骏声均训悦。”^{[6]115} 从情感体验上来说，“悦”显得平淡而稳定，如《兑》卦初九爻辞中的“和兑”，以平和为悦；九二爻辞中的“孚兑”，以诚信为悦，等等，皆不是激情洋溢的喜悦欢乐，而是处处受到理性的制约。因此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悦”始终未脱离哀惧情感的影响，或淡或浓地处于这种氛围之中。

三、忧患意识是《周易》心法的精髓

我们说，对于《易经》中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古人早已看到了。从《易传》开始，就强调“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不少古代的研易者都相当关注这句话，张栻说：“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高攀龙则谓：“一部易原始要终，只是敬惧无咎而已，故曰惧以始终。”（见李光地《周易折中》）显然都认为，贯通《易》之始终有一条主线即忧惧、危惧，此一忧惧或危惧可使人无咎补过，因此又可视为《易》的道理。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古人并未继续深究。

进入现当代，人们的研究视野益发开阔，开

始从各种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周易》的忧患意识，以期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奥义。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先哲对生命存在价值难成易败普遍现象长期观察而得出的深刻认识。《系辞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辞危。”这些表达了后人对《易经》创作背景的猜测和思考，显然属于以史解《易》学派的特征。“文王与纣之事”，是其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其辞危”，是忧患意识的文字体现。史载商纣王荒淫残暴，文王因不满现实而“窃叹”，“以诸侯顺命而行道”被囚于羑里，稍有不慎即罹祸矣。《诗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慎其危也。故《易》之设辞，以此为基，屡言凶险^{[7]183}。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有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之不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不是万物的不能生育，而是万物生育之不得其所。这样的忧患意识，逐渐伸张扩大，最后凝成儒家悲天悯人的观念。儒家这种观念，就相当于佛教的大悲心和耶教的博爱，三者同为一种宇宙的悲情。《周易》之所以见重于儒家，原因之二就是儒家在《周易》中发现了“忧患意识”。《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是儒家自《周易》发现忧患意识的证据^{[8]15}。曾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与自强精神在炎黄文化中始终是统一的。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高扬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同时又注意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明于忧患与故”，“思患而豫防之”。炎黄文化的忧患意识，在于挽救社会危机，拯救人民疾苦，非患个人生命的安危与权利的得失。忧患意识同自强精神相结合，突出地表现在忧国、忧民、忧德三个方面^{[9]73}。也有学者指出，《周易》是圣人怀着忧患意识写成的一部拨乱反正之书。《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传》的这种忧患意识集中反映了处于暴政统治之下的人们对和谐秩序的向往，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忧国忧民，力求克服事实与价值、现实与理想的背离，谆谆告诫统治者在决策活动中应该自始至终保持危惧警惕之心。因为只有知所畏惧，才能减少失误，不犯错误，在冲突之时可以促使向和谐转化，

在和谐之时可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在决策活动中不从忧患意识出发而任意妄为,掉以轻心,则身不安而国不保,必然导致倾覆^{[10]392}。以上的四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近年来易学界对于忧患意识所做出的阐释,颇有重要意义。既能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学术流变等方面,又能从道德观念、主体意识、民族精神乃至社会发展方向等等方面深入论证了忧患意识在炎黄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这显然也应视为易学研究的重要收获。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未能从“心”的角度来探讨《周易》的根本方法。而易学之所以流传几千年,受众面广是没有任何著作能够比拟的,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我认为就在于《周易》的心法像血液一样一直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管之中,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人们把忧患意识念兹在兹,不能须臾或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国歌依然把这种忧患意识世代传唱下去,作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而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我认为,从根源上说,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周易》心法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之一。

尽管说忧患意识的情感因素是浓厚的,具有强烈的发散性,可以通过各种感性的渠道加以扩展和弥漫,但其又不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层面上,因为有刻骨铭心的理性认识作为其深厚的积淀,所以忧患意识又不同于一般的悲伤、伤感、凄惨的纯粹负面的情感。忧患意识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又会激发起人们昂扬向上奋发有为排除万难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可知,历来圣贤发愤著书,皆因遭遇逆境厄运,不单是“作易者”有忧患意识,凡有大作为者概莫能外。当然,这也不仅仅表现在著述方面,任何伟大的业绩和功勋的开创与建立,都需要经过数不尽的艰难险阻和崎岖坎坷,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而最终达到理想的目标的。

《周易》的忧患意识既是周公政治哲学思想的心法的精髓,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早已溶进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千百年来警醒和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不断砥砺、磨炼操守和志气,使自己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因此,可以说,从情感和理性的交汇处,从周公政治哲学思想的综合层面来探讨《周易》的心法是很有学术意义的。笔者以上的论述还是相当粗浅的,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只是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参 考 文 献

- [1]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 李学勤.周易溯源[M].成都:巴蜀书社,2006.
- [3] 江灏,等.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 [4] 朱熹.周易本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5]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 李镜池.周易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 刘玉平.易学思维与人生价值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6.
- [8] 黄庆萱.周易纵横谈[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9] 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10] 朱伯崑.周易通释[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韦航)

试论周公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周易》“心法”之关系

作者：[徐仪明](#)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刊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15, 37 (1)

引用本文格式：[徐仪明](#) [试论周公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周易》“心法”之关系](#)[期刊论文]-[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